



□ 王 瑶

2015年8月，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第一部英文版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这是亚洲人首次获得世界级科幻奖项，也是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2016年9月，《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英文版在美国上市，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单。2017年1月，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谈到他对《三体》的喜爱，并表示，与《三体》中关于宇宙和人类命运的宏大想象相比，自己平日的工作都是在处理一些琐碎小事。

同样在201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详细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讲话。文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对当前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方案。

两组看似并无直接关联的事件，为我们理解中国科幻文学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历史坐标：一方面，中国当代科幻作家凭借对现实的敏锐感受和超前的想象力，将中国人在全球巨变中的复杂体验与艰难思考反映在其作品中，从而无形之中对全世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内涵丰富的回应，并取得了广泛共鸣。另一方面，则是在面对当前人类共同的困境与危机时，中国必须在深刻理解自身现实处境与历

科幻作家们不断尝试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尝试为了新的理想而对这些来自过去的思想资源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赋予中国科幻文学以丰富而迷人的“中国特色”。

史挑战的基础上，向世界提供富有创见的中国智慧和方案，必须有能力去想象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未来，以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不仅植根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及现代化历程之中，更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相连。早在20世纪初，已有一批青年文人积极将西方科幻小说译介到中国，其中就包括我们熟悉的鲁迅与梁启超。在这些人看来，科幻小说中关于未来的丰富想象，能够督促“东方睡狮”从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旧梦中醒来，转而梦想一个民主、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写道，阅读科幻小说可以令国民“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文末一句话写道：“我国说部，若言情谈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

端。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1902年，梁启超开始在《新小说》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小说第一回开篇第一句写道：“话说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岁次壬寅，正月初一日，正系我中国全国人民举行维新五十年大庆典之日。”以孔子诞生为开端的“孔子纪年”，自然是在效仿以耶稣诞生为开端的西历，而后者所包含的线性时间观念，则对循环往复的传统旧历形成了一种挑战和颠覆。正是这种崭新的时间意识，令这部作品不同于过往的任何一部“旧小说”。继而，作者用“未来完成式”的倒叙手法，以1962年作为叙事起点，通过“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老先生”在“上海大博览会”上的一番演讲，勾画出1902—1962年间的“中国六十年近代史”。在这六十年间，通过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变革，中国由古老帝国蜕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然而，走上富强之路的中国并没有称王称霸，而是主导各国召开“万国太平会议”，签署“太平条约”、商谈“万国联盟”。这样的图景，正与梁启超老师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谋而合。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未来记》只连载到第五回便戛然而止，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却让我们看到，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想象，总是一方面以某种关于“世界/西方/现代文明”的认识为范本，另一方面又试图对这一范本有所超越。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各种关于未来的想象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得到呈现，更深深内在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文化之中。无论是对现状的认知、对历史的反思，还是变革与发展的内在动力，无不与一种建设民

掘把握，评选流程的设计控制，都应该明确、具体、严谨、可行。有了这样的过程设计，评选结果才可能真正体现民意，实现最大限度的公正权威。

但网络投票恰恰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它的优势是便于营造氛围、聚焦热点、影响导向，却难以保证过程的规范和严谨。投票方式的民间化和投票过程的个性化特点，为求助者动员广泛的邻里亲朋参与投票提供了便利，也使受邀者很难拒绝这样的帮助。但是在投票者对评选对象不了解甚至不认识的情况下，决定人们投票取向的就不是可能是参选人的自身素质，而是参选人的社会动员能力。既然由人情票、关系票支撑的网络评选，是投票人自身意愿的虚假表达，与真实的民意没有什么关系，它就必然成为对公正和诚信原则的公开践踏。此类评选活动的主办单位采用网络投票方式，看似动员广泛、声势浩大且时尚民主，自以为只要追随了时髦的东西，自己也就会时尚起来、洋气起来。实际效果却南辕北辙，不仅愚弄了公众智慧和感情，而且也是一种自我愚弄。这样的创意是缺乏思考力、判断力和执行力的表现，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技术、新手段的滥用。

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并不是同义词，科技进步只是为社会进步提供了基础、提供了新的选择机会，但如果科技成果的使用者缺乏清醒的头脑，对科技新成果把握不准、运用不当，科技进步客观上甚至会妨碍社会的进步。网络投票的娱乐化、游戏化苗头给我们提供的也是这样的警示：互联网为社会的繁荣发展注入了巨大的动力、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也为滥用和扭曲民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为避免这种可能成为现实，维护社会评选活动的严肃性，维护民意表达渠道的声誉和质量，有关部门可考虑出台引导性政策，对网络评选活动进行规范和界定，对不适宜的领域或事项，应禁止或限制使用网络投票方式。

警惕游戏化倾向的网络投票的

□ 齐忠亮

与微信等互联网终端技术的日益普及大致同步，网络投票活动也受到不少机构的青睐，成为助力商业营销、社会公益乃至政府部门施政活动的技术手段。仅最近一个时期，笔者就受邀参加了“科技之星”“最美军属”“超赞群主”“街舞达人”“最可爱警花”“少先队干部”等名目繁多的微信评选活动。

类似这样的网络评选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民间文化、手机游戏行为，兼有同好联谊、聚敛人气、品牌推广、商业营销等特点，图的就是个欢心热闹，主动或者被动给认识的不认识的、了解的不了解的参选人投上一票，不算什么问题，不必太计较。但也有不少网络评选活动等，主办单位都是政府部门或者由政府背书的重要社团，涉及的也是参选人品行业绩的公众评价、国家荣誉的社会认证等重要问题，因此，评选主体、评选对象的界定，评选标准的拿

族国家的迫切需要，或者说一种想象未来中国的方式互为参照。与此同时，为了令这些未来想象有别于“今日西方”，科幻作家们亦不断尝试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不断尝试为了新的理想而对这些来自过去的思想资源进行再阐释和再创造。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赋予中国科幻文学以丰富而迷人的“中国特色”。

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是一个充满内部差异性的共同体，这些差异包括年龄、地域、专业背景、社会阶层、文化归属、创作理念等各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理解、对于未来的态度，在各位作家那里也各不相同。然而与此同时，由于这些作品首先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因此作家们所关注和思考的，永远是与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的人们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则又以更加错综复杂的方式，与全人类的集体命运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紧密纠葛。如果说中国读者从西方的科幻小说中，读到了身处现代西方文明世界的人们对于自己亲手开创的自身命运的恐惧与希望，那么西方世界的读者，则可以将阅读中国的科幻小说，当做体验中国另类现代性经验的一种方式，并从中获得新的思想与文化资源。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科幻小说反映的是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对人类情感、价值、生活方式及文化传统的冲击，而中国科幻文学的“中国特色”，正是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与其他外来文化对话、互动以及自我重建的产物。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科幻作家如何积极寻求与世界对话，如何处理宏大叙事与“民族形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理解和探索自身与西方科幻作家之间的“和而不同”，这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带出一系列与中国主体位置相关的文化政治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国人在“世界历史”之中扮演着，并且将可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中国”在当代科幻文学中的呈现方式，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理解这种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所身处的时代，并更好地去想象一种不一样的未来。

文艺评论

文艺人的名号

该以怎样的心态去理解文化自信的内涵？该以怎样的姿态沐浴文化自信的魅力？该以怎样的行动去践行文化自信的使命？

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不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先秦，还是名家辈出、泰斗林立的秦汉，不论风骨卓然、纵横清淡的魏晋，还是诗词高耸、艺术辉煌的唐宋，抑或戏曲小说冠绝当世的明清、新文化狂飙突进的近代，后世公认的“文艺大师”，无一不基于其思想的独立判断、执着的文化修炼、天赋的灵感启迪，并最终以作品来奠定其艺术高度和人格厚度。

在文艺发展的大时空中，人们渐渐形成了“历史只承认作品”的基本认知。在而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人心浮躁，一小部分文艺人基于功利之自我包装，或借壳上市，或攀龙附凤，或拿钱开路，进行自

老朱儿时的理想是当村支书，因为他上大学之前没吃过猪肉，而支书家孩子的嘴巴经常油油的。第一次吃猪肉的时候，老朱差点叫出来：天哪，世上竟有如此美味！大学毕业后，老朱踏着邓公南巡足迹，直接去深圳创业，不多年便“先富起来”了，据说顿顿有燕窝、鲍鱼吃。我曾打趣说：想吃什么有什么，该满足了吧？

老朱眯着眼睛，一脸憧憬地说：我想既吃到猪肉，又有当初那种满足感。

“土豪”蹦出的哲理引起了我的共鸣。近40年来，时代以加速度的方式发展，人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变化之大，过去肯定没人想到过。回首往事，恍若隔世。兵马俑突然活过来，目睹世界与嬴政时代的差异，其感受也不过如此。如果说变化带来了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有些感觉找不回来了，比如“吃嘛嘛香”。

有位老同志告诉我，他念小学的时候，下课后操场上很少有学生，因为肚子里没食儿，不想动。现在人们跟老朱一样，想吃什么都有，却觉得没什么好吃的，胃口越来越糟，口味越来越重，也许川菜就是这样火起来的吧。同样的，大人天天追着孩子喂饭，孩子并不领情，越跑越远。

在我的大学时代，大家最期待的是掌握信箱钥匙的同学大喊：张三，你的信，又是复旦的！或者传达室师傅通过小喇叭说：221李四在不在？女孩子电话。那个时候一个月“只够”书信来回一趟，中间满是焦虑和甜蜜的梦想，一年就在十来封信中过去了。

李四害怕错过电话，常常穿一只鞋就跑下楼，假如他正好去了图书馆，回来后要懊恼很久，就像现在买了张只差一个数的彩票。后来寻呼机节省了中间程序，但是回电话需要排队，照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进入互联网时代，以伊拉克战争现场直播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同步时代，甚至连快递都嫌慢，曾经红极一时的电子邮件差不多被微信取代。可是在免除等待之苦的同时，等待之“乐”也随之消失。

我记事的时候正遇上“文化荒”，所以逮什么看什么，反复看。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林海雪原》和《水浒传》，每回都像第一次看那样如痴如醉。《地道战》《侦察兵》等电影也反复看了不少年，小伙伴们都会饶有兴趣地模仿片中对白，比如汉奸恭维鬼子的话：高，实在是高！比如威风凛凛地说：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如今书籍像食品一样丰富，却难得真心喜欢一本书，电影院更是多年没有进去过。正如一位诗人的感慨：如今他走进书店，“为自己的无动于衷而恼火”。但他为什么无动于衷呢？

前人早已注意到这种现象，因为尽管时代和境遇不会重复，但人类的感受经常是相似的。法国随笔大师蒙田断言：越是得不到越是珍惜。德国经济学家戈森用边际效应理论证明，某种享受一旦持续得到满足，初始的满足感就会递减，直至饱和。叔本华的“钟摆理论”则比较悲观：贫穷则痛苦，充裕则厌倦，人生恰如钟摆，

老朱的渴望

□ 单纯

总在痛苦和厌倦之间摇摆。我国有位作家总结道：欲望越是容易满足，越难以满足。这些道理很好地解释了孩子为什么不愿意吃饭，老朱为什么渴望当初的满足感，我为什么不能如饥似渴地读一本书。而即时通信在增进爱情的效率方面，感觉不比缓慢的书信强多少。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进步在给人十个满足的同时，又会偷偷克扣六七个、甚至更多？现在怀旧成为时尚，既然后看，自然会有意无意飘散着“过去更好”的味道，比如过去夜不闭户，过去的天比现在的蓝，等等。问题是，过去家徒四壁，有必要闭户吗？大家一起穷真的好吗？要求鱼与熊掌同时兼得，这理性吗？假如认定是即时通信毁了爱情，那么随皇宫流水漂出的红叶，富家小姐随便抛出的绣球，找到爱情了吗？依我之见，古今中外的爱情悲剧，多数与沟通受阻有关。

怀旧乃人之常情，守旧则值得警惕，因为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社会一定要向前进。当年孔子总抱怨今不如昔，极力主张恢复周礼；老子坚决反对使用“十百之器”，因为背离了社会进步的方向，他们毫无悬念地遭到失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对这个道理，人民群众、特别是过来之人是坚决拥护的。那天我还问老朱，既然如此，不如让你回到猪肉很香但无肉可吃的童年，如何？老朱连连摆手，摇头如拨浪鼓。

当然，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下一步就要努力降低进步代价、不间断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认真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之后，下定决心“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人民的期待无止境，我们的追求无止境。